

浮生常博物 记得去看花

——从《舍象与秋水变焦》谈哲学求索中的博物学定位

●刘华杰



其丰富的区域，人们也常常忽略身边的本土物种，而盲目引种外来植物。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恰恰反映出我们对脚下土地的生疏、遗忘甚至蔑视。重建连接，必须从认识身边的一草一木开始，重塑审美趣味。我乐于观察校园的野草、北京山野的遍地梅、再次品尝故乡的野菜——这类亲身体验、具身认知是生态意识与文化自信生长的真正起点。博物学实践提供了桥梁和眼光，引导人们从“看见”走向“理解”。

面对人工智能的浪潮，博物学又当何为？我的答案是辩证的。AI 理顺了大量现有知识，是极好的辅助工具。但它存在明显的“数据边界”：其判断完全依赖已有的数据输入，过分依赖它将导致根本性的生存迷失。这时，人类个体与万物直接互动积累的第一手知识、情感，就显得至关重要。未来的方向，应是让 AI 与 NHI (natural history intelligence 意为博物智能) 齐头并进。

在推广中，应将“兴趣”置于首位，依兴趣研习、拓展。人总得有所热爱，当这些兴趣点逐渐连成一片，便会形成个人对世界的系统理解。现代社会过度强调效率，忽视了休闲与“亲知”的价值，而博物学正好弥补这一缺失——它鼓励人走出教室，在自然中自由探索。我在北京大学开设相关课程，也强调户外实地教学。教育的意义之一，或许就是给人足够的、不被安排的“自由时间”，让他们在自然中玩耍、观察、提问。

现代人疏远自然的原因，部分归结于“自由时间的消失”。从幼年到成年，个体的时间被精密规划。而博物学活动所需要的，正是那种可以发呆、漫步、专注观察的“缝隙时间”。自然界中的动物，吃饱后会玩耍、闲逛、晒太阳，这对生命而言并非浪费。对人类来说，自由时间同样是心灵的栖息地与创造力的土壤。我曾将自己的一本文集命名为《自然与自由》，正是想传递：走进自然，能帮助我们重新体验那种被现代生活剥夺的自由感与从容。

这种体验不应成为另一种“任务”或“绩效”。博物无须设定目标，只需单纯地去看、去感受。身体自会放松，心灵自会打开。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真正的成长是保持对世界的敏锐与热情。博物学让人回归“孩童”般的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们顺从“合乎自然法”自在生存。

重启博物学，意味着让普通人作为主体，传承和发展这种“博物智能”，绕过过度专业化的“中介”，启动我们本自具足的“具身认知”能力，直接去访问、理解大自然。每个人都能在认识家乡的百种草木虫鸟的过程中，构建属于自己的、鲜活的“生态”概念，做出更负责任的环境判断，而不是仅仅听从专家所言。这或许才是生态文明建设最深厚的根基。

“诗意地栖居”是一种美好愿景，而博物实践有助于抵达这一境界。在《路德基本著作选》中，有一个章节标题名为“living as a Christian”（基督徒人生）。巧合的是，我也曾杜撰过一个词组“living as a naturalist”（博物人生）。在当今时代，人们完全可以主动选择成为一名博物实践者。“我思故我在”很有名，其实“我博物故我在”更有道理。浮生常博物，记得去看花。（据《光明日报》）

全民阅读 焕发文化活力

●王蒙

劝学与提倡阅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破题宣示。《论语》第一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其后有“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白首方悔读书迟”（颜真卿）；“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面目可憎”（黄庭坚）；“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朱熹）。

一个人必须读书吗？全民都需要好好读书吗？答案是肯定的。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今天完全可以理解为这也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一个抓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这样的历史使命，并成为我们做人的一个重要导向。

20 世纪到 21 世纪，我们国家经历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如今又走上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积贫积弱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余年艰苦奋斗的胜利，也是我们党一路不断学习的胜利，是学习理论、学习战争、学习建设、学习科学的胜利，是阅读攻读苦读、创造性地汲取消化中外文化精华、不断武装优化提高自身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国内外各种新课题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在潮头，不断学习，高屋建瓴，带领中国人民抓住发展机遇，创造了全新的历史。如今，党中央把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公布，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我们期待，在得到国家制度与立法保障之后，在顶层设计的推动倡导下，中国将迎来一派书香的美好景象！

有朋友说，我天天在刷屏阅读呢。但是，你可能只是读了一些段落而已，其中还夹杂着不少靠不住的泡沫。碎片化阅读使你不能确切了解事物的来龙去脉，不能系统地掌握知识得出结论；滑动阅读使你一目十行二十行而不能有所思有所悟，不能深刻地记忆成为自己的知识。所以常常是，你读了、你花了时间，却记不住、说不清、道不明。研究表明，纸质书比电子书在记忆效果和阅读深度上优越得多。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网络和人工智能在阅读中对于归纳与查找带来的方便，但是最终，知识应该进入我们的头脑而不是仅存于媒介的存储中。

有朋友说，我天天奔忙，没有时间读书。但是我们要说，点滴时间是完全可以用来读书的。鲁迅先生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坐地铁、旅行、家务之余，积少成多，总能阅读。现代生活，如此便利，既不是戎马倥偬，也不必事事亲为，便捷交通、快递外卖，已然为我们省却不知多少时间，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读书意愿了！古人家贫买不起灯油，尚且囊萤夜读、映雪读书，我们现在处处是舒适的桌椅、明亮的光线，还有那么多不读书的理由，岂不是愧对先人？即便仅从个人发展来说，不充实提高自己，能跟上时代，能做此此生应有的贡献吗？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给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的人，多是志向远大的人，同时也是勤奋学习、饱读诗书的人。到了 21 世纪，我辈总不能在面对新媒体的便捷性、海量信息时，把大把的宝贵时间，用到趣味性八卦性的浏览上，总不能放弃严肃正道、知性学习的纸质书籍阅读，以传闻噱头、装腔作势的“喷”与“哄”取代知识的汲取与把握。我们需要回顾刘剑英元帅的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攻读苦战之后有大成就快乐大进步，而这是浅读快读碎读所做不到的。

现在，从政策导向，到法治保障、制度设计，都在向有利于全民阅读的方向优化，但我们还有更多期待。文化宣传部门，对于爱读、善读、好读的人士，可以有所奖评宣传；对于有定论的经典好书，可以组织阅读、研讨、讲习；教育部门，应以培养青少年阅读习惯、引导阅读立志为目标，更多在教材和阅读内容的选择上下功夫。图书馆、版本馆是我们的文化标志，是形成文化氛围的要素，我们的图书馆版本馆还需要扩大典藏数量质量，需要在改善引导服务、保护文物善本、扩大影响、增加利用、支持科研、发展对外交流、引进新学科等方面全面提升。同时，也还要经营好小小的读书天地。家庭，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所有人的出发地和归宿地，许多人的读书习惯正是在家中养成的。家庭成员在家是读书还是各自刷手机，对孩子的终生影响将截然不同。

读书吧，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读得更好，学得更好，实践得更好，这将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自信心、进取心、获得感、幸福感。中华大地，处处书香，那该是多么欣欣向荣的气象！（据《人民日报》）

最近，我出版了名为《舍象与秋水变焦》的新书。书名乍看有些新奇，实则是想探讨自然科学与博物学背后不同的认知方法。其中“舍象”一词古已有之，简单说就是根据需要主动化简，忽略无数细节，把握其关键特征，这不仅是科学方法，也是一种应对信息过载的生活智慧。但是，舍象有可能导致严重失真。“变焦”则借用了摄影的比喻，而“秋水”取自《庄子》，意指像调整焦距般动态观察世界。理解这两种方法论，有助于我们认清科学与博物学的性质，反思过于倚重工具理性的科技文明可能存在哪些盲点。

研究哲学的人，为何要关心看似“接地气”的博物学？哲学似乎总在云端与抽象概念打交道，而博物学则俯身大地，与具体生命为伴。一上一下，如何融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国内，最早重新发现古老博物学价值并试图复兴它的，恰恰来自科学哲学界，而非通常认为的科技界或科普界。

这并非我们独有的境况。环境伦理学的奠基者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三世早年攻读物理，后转学神学与哲学，却对这些领域的做法不满。他回忆说，在那个时代，顶尖的科学哲学家普遍认为“博物学是最糟糕的科学”，以至于他对博物学感兴趣而“不得不表示歉意”。在那种氛围下，大自然本身被认为毫无内在价值，只是人类利用技术的资源。罗尔斯顿的成功堪称“险棋”，如果他当初没有深厚的博物学爱好，或者一味追随当时主流的科学哲学潮流，恐怕难以开辟出环境伦理学这片新天地。当他初步形成理论并尝试投稿时，甚至不敢投给声名显赫的期刊，只找到一家边缘刊物，即便如此仍遭拒稿。几乎不抱希望地转投权威期刊《伦理学》后，却意外被接纳。此后，他亲手创办了《环境伦理学》这一国际期刊，并出版了影响深远的文集《哲学走向荒野》。

我个人的路径也有些相似。大学本科我学习地质学，毕业前夕对非线性动力学产生浓厚兴趣，遂在研究生阶段的六年时间里，专注于与浑沌和分形相关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工作后偶然接触科学知识社会学 (SSK)，我的科学观随之发生深刻变化。正是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我重新发现了博物学的魅力，进而深入研究其文化内涵，特别是它与科学的关系。我也时常面对一个根本性质疑：你所谈论的博物学，是科学吗？这与当年罗尔斯顿听到的“最糟糕的科学”之讥，在精神上遥相呼应。

在我看来，博物学是人类文明中一套“顶天立地”的、经过漫长历史检验的可靠知行体系。但在今天，当我们谈论“复兴”或“重启”博物学时，面临一个深刻的矛盾：我们试图以一种更完整、更贴近生命本真的方式去认知和介入世界，然而现代社会的一切认知活动，似乎都难以逃脱“科学”这一强势话语的评判框架。如果新博物学宣称自己比科学“更科学”，在逻辑上将陷入双重困境：不被承认，亦不愿为伍。

于是，我提出了“平行论”的构想：博物学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应当被视为与“科学”平行存在与演化的知行体系。它无须依附科学成为其“前身”或“附庸”，也不必站在

科学的对立面。“平行论”的核心思想，是主张博物学保持自身的独立品格，同时主动向科学学习，并为之保持一个合适的、能够相互审视的“审美距离”。在科学已高度专业化、门槛高筑的今天，以普通公众为主体的博物学，其价值恰恰在于提供一种平行、平等且人人皆可参与的认知通道。

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个康德式的追问：普通人的博物学实践，究竟何以可能？如果它不能为这个时代提供独特的视角与智慧，其复兴便失去了实质意义。必须承认，在现代“权力—资本—技术”交织的庞大体系中，为博物学寻求制度性支持或许是一种奢望。真正的出路，可能在于一种价值观的“重新赋值”：在“人类世”的背景下，通过“爱智慧”的哲学追问与广义的生态感知，重新审视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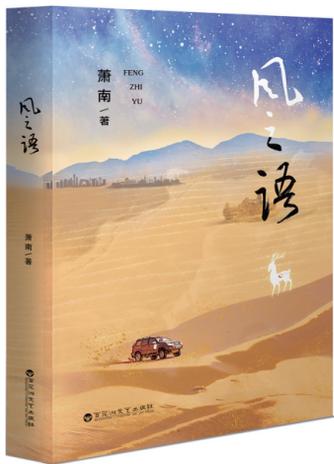
现代人正面临一种深刻的断裂——与自然的情感联系日渐稀薄，自由观察与感受的能力悄然流失。基于我数十年的野外考察与哲学思考，我认为，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今天，复兴古老的博物学，唤醒每个人内在的“博物智能”，正是重新构建人与自然对话、找回生活实在感的重要路径。

人类学习的初衷本是为了生存，然而现代教育却陷入了“速成化”困境，无形中割裂了人与本土环境的情感联结。我在云南勐海等地考察时发现，即便在生物多样性极

在“旅行”中寻找爱和希望

——读萧南长篇小说《风之语》有感

●敬笃



萧南长篇小说《风之语》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萧南正式出版的第二部图书。作为早年在“榕树下”从事网络写作的作家，萧南的小说很好地打通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壁垒。从我认识他那一年算起，他一直在尝试着变化，从校园青春文学到武侠小说，再到这部哲思小说，他的创作意味着一个作家从最初的试探性写作，到今天的成熟性写作转变。身为公务员的萧南，平日里忙于公文写作的同时，还能兼顾文学创作，实属不易。当然，他能在公文写作与文学写作之间找到一种语言的平衡，这也恰恰折射出他已经具备优秀作家的品质。

在作品介绍中，有这样一句话深深地吸引我，“本书是寻找爱和希望的故事，也是关于‘一带一路’的哲思小说。”无疑，这种定性带有冒险性质。但是，这也吸引了我的阅读兴趣，爱与希望究竟是如何与“一带一路”融合在一起的呢？我带着这样一个问题，读下去。“爱与希望”作为中国当代小说的主题，早已司空见惯，但将其与“一带一路”融合的写法尚未多见。

事实上，这是一部探讨“旅行”的小说，也是一部寻找生活之镜的小说。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说过，“别的地方是一块反面的镜子。旅行者能够看到他自己拥有的是何等的少，而他从未曾拥有和永远不会拥有的是何

等的多。”“旅行”意味着去他乡寻找更多可能性。许多人会选择“旅行”来缓解自己的精神压力，沿途的风景可以治愈个人的焦虑，可以将个体从自我的精神困境中解放出来。小说中呈现了三重焦虑：其一，顾之风背负着精英阶层的存在主义焦虑；其二，安琪承载着原生家庭破裂的情感创伤；其三，张露隐匿着与九色鹿传说相关的精神执念。不难想象，背负着精神压力的他们，在“一带一路”上相遇，绝非偶然，其中隐含着某种文化必然。

这部作品与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切·格瓦拉的《摩托日记》、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等知名公路小说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公路小说通常以主人公在公路上的旅程为主要情节线索，通过旅途中的所见所闻、经历的事件以及遇到的人物来展现故事。它融合了旅行、冒险、成长等元素，强调在路上体验和对他人的思考。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于 1955 年发表的《Free Air》，被认为是第一部公路小说，它奠定了公路小说的基本主题和风格。《风之语》通过主人公顾之风与五岁女孩安琪的跨地域旅程，试图在奔驰的越野车与散落的文化密码之间，找到“公路世界”的文化要义与历史图景，进而完成一场关于文化寻根、人性救赎与文明对话的深刻探索。

在书中作家写道，“旅行，是心灵流浪的一种方式；它是孤独者的选择。”的确，“旅行”恰是这部小说的灵魂，以动态的方式诠释生命内部的张力，来缓解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小说采用“双重视角”的叙事方式，注重“成人视角”与“儿童视角”的互补，如此一来可以将“一带一路”沿线所遇到的戈壁的荒凉、草原的辽阔、古城的斑驳，作为他反思现代性困境的双重镜像，尤其是五岁的安琪以天真无邪的儿童视角看待世界，成功消解了成人的生命之重。她对“太阳那边”的追问、对九色鹿救赎逻辑的困惑，形成对成人理性思维的温柔解构。当她用“稚嫩的声音，轻声哼唱《龙的传人》”，声音很美，让人联想到天堂的天使。”此刻的童谣不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而成为文明基因代际传递的声波载体。在她眼中，九色鹿并非单纯的神话传说，更代表着那些没有被功利主义侵蚀的纯真信仰。无疑，作家恰当地使用了儿童视角，以轻盈的姿态将“一带一路”沿线的历史厚重感落下来，这样使得成人视角下的污浊、苦难、悲悯变得轻盈而自然。

诚然，《风之语》的深层价值在于对现代文明病症的诊断，并以切近童话的方式给出相应的处方。顾之风对“鲁滨逊式自由”的向往与张露对九色鹿的执着追寻，无不折射出他们对工具理性社会的无声反抗与对生态伦理的渴望，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作家对这些人物的塑造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体

的自我救赎。这种视角的选择，无疑是作家故意为之，他借此来接受灵魂的洗涤。在小说内部，作家注重细节的描写，多次提到敦煌月牙泉的水位下降、草原塑料地膜的凤化、深山老林的过度开发等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意在制造一种现实的“粗糙感”与“拒斥感”，是一种典型的生态主义写作模式。《风之语》通过对现实与理想之间矛盾冲突的构建，将现代文明进程中的生态之殇刻画得生动、鲜活，且有一种具身感，发人深省。

福斯特认为，情节就是逻辑智力层面上的小说：必须有神秘感，但是谜团后面都要解开；读者可以在尚未认知的世界里到处摸索，小说家却是没有疑虑的。作家通过巧妙地设置一些突发事件，作为具有神秘感的情节，比如汽车爆胎，误入警局、牧场狩猎等场景，虽然这些桥段在诸多作家那里都有所描绘，单从选材上而言相对陈旧，但由于发生在“旅行”之中，故事便显得更具西部色彩，能够很好地衔接整个故事链条。小说以“寻找九色鹿”为主要线索，串联起“一带一路”沿途的历史遗迹以及当代图景，重构了“九色鹿”的当代意义，使得“九色鹿”更具神秘色彩的同时，凸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与自觉。

当然，这部小说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或许与作家想要表达的内容太过庞杂有关。从整体上而言，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作家想要将中西文化之差异融入其中，但切入点相对单薄，思考的力度不够深入；在角色设定方面，尤其是张露这个角色，通过“寻找九色鹿”来贯穿理想主义者的旅程不是不可以，但过于渲染反倒使得整部小说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在现实主义描写模块，脱贫攻坚、企业转型等社会化问题融入略有牵强，没有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过渡。

不过，瑕不掩瑜。我们可以在小说的最后部分，感受到作家将故事情境设置在顾之风召开的家族企业战略会上，其目的是为了对应前文，将“九色鹿精神”引入企业文化，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最终的和解，也象征着这一故事链条最终形成了情节上的闭环。

总而言之，作家以“公路小说”特有的叙事架构，将事实的偶然性融入其中，增加了整个故事链的奇幻色彩。人物在“旅途中”所经历的一切，以及故事发生之后的反思，是一种文明的反思，也折射出一位优秀作家现代性审视的能力。毫无疑问，萧南的《风之语》中这场跨越地理与心灵的旅程，是一场充满诗意的救赎之旅。我们相信，萧南的写作一定是在诠释自己的人生，以及那些无法释怀的“旅行”之梦。他在不断地挖掘隐藏在“物”背后的世界，力图在现实困境中找到自我的精神信仰以及那些被遮蔽的生命密码。